

中国航天事业的浪漫名字

随思录

桂晓燕

北京时间4月16日，载着我国三名航天员的神舟十三号飞船返回舱，在位于内蒙古的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。这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阶段的最后一次飞行任务，取得圆满成功。中国的航天事业，又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上。

航天科技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最高成就之一。中国航天作为航天时代的后起之秀，经过多年的厉兵秣马、积蓄力量，在进入新世纪后，一飞冲天、一鸣惊人。且不说别的，就连航天领域的名字，一个个都是那么精彩浪漫，尽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您瞧，航天飞船叫做“神舟”，载人空间站叫做“天宫”，行星探测任务是“天问”，中国探月工程是“嫦娥”，月球车名叫“玉兔”，火星车名叫“祝融”，全球定位系统称为“北斗”，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称为“悟空”……

“神舟”意为神奇的天河之舟，又是“神州”的谐音，用“神舟”来为中国的航天飞船命名，可谓“神”来之笔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，在一首《渔家傲》中，就描写过这样神奇的天河之舟：“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……九万里风鹏正举，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！”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云雾弥漫、天河流转、无数神舟在波涛中起伏出没的神奇景象。作者最后的愿望是：风不停地吹，将神舟直送到神话中的三座神山（蓬莱、瀛洲、方丈）。全词想象丰富，意境壮阔，充满了浪漫色彩和豪放气概。如今中国的“神舟”，正一次次驶向浩瀚的太空，探索“仙山”的奥秘……

“天宫”顾名思义，就是天帝、神仙居住的天上宫殿，比喻绝佳的生活环境。大家知道，航天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职业，生活和工作环境与地球上完全不同。要求航天员不仅体格健康，心理素质优秀，而且对航天环境具有高度的耐力和抗压能力。因此，人们希望能为航天员尽量提供舒适的环境。将航天员居住的空间站，命名为“天宫”，正是寄托了人们的这一愿望。

“天问”来源于2000多年前，战国时期爱国诗人屈原的长诗《天问》。天问就是问天，是对日月星辰、天地万物乃至人世一切现象的发问，表达了作者探索自然、追求真理的坚韧与执着。中国航天的“天问”，体现了中华民族在探索自

然奥秘和宇宙空间方面，所具有的文化传承和执着精神。这正好用屈原在《离骚》中的一句名言来形容：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“嫦娥”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代表人物之一，中国人没有不知道嫦娥奔月传说的。于是顺理成章，中国航天事业空间探索的第一站——月球探测工程，其名字非“嫦娥工程”莫属。其中首颗绕月人造卫星，就叫做“嫦娥一号”。有“嫦娥”就有“玉兔”，嫦娥是抱着玉兔飞到月亮上去的。月宫中冷清寂寞，“碧海青天夜夜心”，多亏玉兔时刻陪伴在嫦娥身边，相当于嫦娥的闺密加宠物，关系勿要大密切哦。所以，中国航天的首辆月球车，理所当然就叫做“玉兔号”啦。“玉兔号”长着腿，在月球上能走能爬，灵活得很，真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

您知道吗，嫦娥原来不叫“嫦娥”，叫做“恒娥”。那后来为啥改名了呢？这是中国古代奇葩的“避讳”制度造成的。简言之，凡是帝王、大官或长辈名字中有的字，小老百姓或子孙就不能用，必须避开。恒娥的“恒”和汉文帝刘恒的“恒”撞车了，那只得给皇帝老儿让路。先是《淮南子》这本书里将她改成“姮娥”，有半边相同，还不行，最后改成了“嫦娥”。

那火星车为什么叫“祝融号”呢？因为祝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火神，跟火星有关嘛。旧时文人讲话，喜欢引经据典，常用“祝融”两字来代替火星。

至于全球定位系统为什么叫“北斗”，那就更好理解了。“北斗”位于苍穹北方，由七颗亮星组成，状如一只带柄的斗，是夜空中特征最鲜明、最引人注目星象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光明和方向。正如电视剧《水浒传》里众好汉所吼的：“大河向东流啊，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！”言简意赅地阐明了北斗星的高地位和指路（导航）作用。将全球定位系统命名为“北斗”，实在是恰到好处，舍它其谁？

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，念起来不是有点长？聪明的中国人信手拈来“悟空”两字，作为它的名字，既简洁明快，又一语双关。悟空悟空，领“悟”太“空”；悟空悟空，火眼金睛！让我们的科学家像孙悟空那样，目光锐利，能在无边无际的太空中，捕捉到暗物质的踪影。

万里江山，奔来眼底；数千年往事，注到心头。只有这样的国家，这样的民族，才能在现代的高科技领域，融入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，闪烁动人的光辉。

山清水秀四明山

四明山脉绵延六十里，由四明山、雪窦山、凤凰翼、撞天岗、杖锡山、大岚山、大俞山、大雷山等多个山峰连接而成，层峦叠嶂，翠盖千重，境佳蕴盛。

道教典籍《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》及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等文献记载：“天下之洞天三十有六，四明山为第九洞天，曰丹山赤水洞天。”早在汉代开始，就有道家、道士先后在此采药炼丹，著书立说，筑宫修道，留下众多神秘有趣的“仙味”地名。

宁波地名谭

徐雪英

刘樊升仙的大岚山和刘阮遇仙的四窗岩

余姚四明山腹地有大岚山，原名大兰，因山高湿大，常常云雾满山岗，故易名大岚。大岚峰高水深，石怪林秀，自古即为道家胜地，不少方士仙客托迹于此。传东汉末年，有白道人在大岚山潺湲涧侧修道。上虞县令刘纲慕其道士，于洞畔结庐学道。道成于此升举成仙，故大岚山又名升仙山。升仙时鞋子掉落，化为卧虎，山再名伏虎山。山多青石，剖之皆有九窍，故名孔石。夫妻俩学道时，常喜欢在山下溪水中洗药，溪水因此得名洗药溪，亦称紫溪。后人为这对仙侣建造的纪念祠宇，俗称白水宫。

大岚山村境内有四窗岩，亦称四窗、石窗，俗称大俞山。其崖腰有洞，可容数十人。内有四穴，明亮如窗，故又称“四明洞天”。四明山由此得名。唐代监察御史刘长卿游历四窗岩后这样形容：“苍崖倚天立，覆石如覆屋。玲珑开户牖，落落四明目。”作为四明胜境，四窗岩自古就有仙迹流传。最著名的当属刘阮遇仙传奇。

南朝志怪小说《幽明录》收录此传奇，大意云：东汉永平年间，剡县（今绍兴嵊州）人刘晨、阮肇入天台山采药，遇两位绝色仙女，双双结为夫妇。半年后，两人思乡求归。二女甚感遗憾，作歌送别。刘、阮回家，竟发现子孙已传七

代。想再回二女处，已路迷难遂。后人考证，东汉时四明山、天台山尚未划分，同谓之天台山。故事提到的刘阮遇仙处应为大岚镇的四窗岩。唐代后，刘阮遇仙传奇被广泛写入诗词歌赋，成为浙江早期最负盛名的仙道传奇故事之一。

仙人遗梨的梨洲山和神仙警雷的大雷山

余姚四明山镇有梨洲村，以村内梨洲山而名。梨洲山地处四明山心，风景恍如入世外，鸡犬相闻石岩间。传古时山上多野梨，成熟季节，野梨数枚，人迹杳然，疑为仙人真所遗。故名其地曰梨洲。”这是梨洲山得名的另一版说法。因为仙名在外，梨洲山一带吸引了不少人雅士前来游历吟咏。明代诗人汪纶有诗云：“梨因孙绰来时见，桃是刘纲去后栽。”明末清初，黄宗羲四明山结寨抗清时，也一度居于梨洲村，在镇东桥著书立说，设馆讲学。自取别号梨洲老人、梨洲山人，后代学者遂称其为梨洲先生。现梨洲村内建有黄宗羲纪念馆。余姚城区则有梨洲街道，为黄宗羲故里，故以黄宗羲别号为街道名。

海曙横街镇有大雷山，亦名南雷山、外雷山，疑以山间多雷电而名。《四明山志》则记：“山多禽兽，每为猎人所藉藉，神仙警以雷火，故有是名。”山前有静水洞，为南朝诗人谢灵运隐居读诵之所。其后唐朝高士谢遗尘也传于此山隐居。闲眠时和好友陆龟蒙、皮日休等一起吟咏和唱四明山诗，让四明山声名鹊起，对四明山人文产生重



黄梨洲纪念馆一角。

(图片为作者提供)

大影响。不过后代不少学者考证认为，谢遗尘隐居的并非横街大雷，而是奉化大雷。如元代戴表元《剡源集》云：“剡源石门大雷山，谢遗尘所居。”

梅福施药的东明山和葛洪救民的灵峰山

余姚梁弄东明山有梅仙井和梅福草堂，传为西汉梅福隐迹处。梅福，今安徽寿县人，汉成帝时担任江西南昌县尉。因不满王莽专权，多次上书指陈政事。屡次不被采纳后，挂冠离职而去。后四处游历，求师慕道，一度曾在浙江各地云游隐居。梁弄东明山民间传言，梅福初入此山时，见多龙穴，内蛇每吐气成楼阁。旁有石库，内贮仙药、神仙经籍。梅福成仙后，多次化作乞丐到东明山仙井施放仙药，为山民解除病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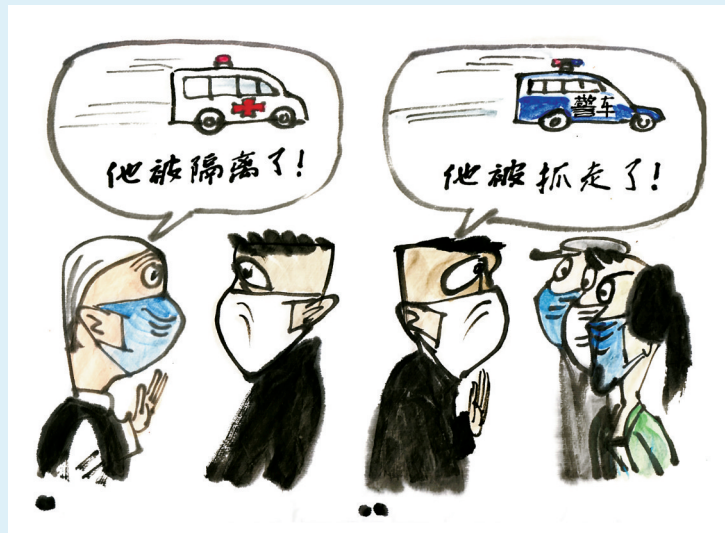
鄞州横溪大梅山，传也因梅福归隐而名。山上有石洞、仙井、药炉、丹灶等遗迹。高新区梅墟街道，则传以梅福裔族聚居而名，

以姓和市墟得名。汉高士严子陵，余姚人，余姚民间传其为梅福三女儿女婿。

北仑大碇有灵峰山，古称瓶壺山，后因有多处葛洪遗迹和广泛民间信仰，号称当地“第一灵山”而名灵峰。葛洪，今江苏句容县人，世称小仙翁。作为东晋医药大家，葛洪在我国民间影响甚大，传说故事内容十分丰富。北仑灵峰山一带传言，葛洪在此山炼丹时，正逢宁波瘟疫爆发，他四处采药施药，挽救了很多山民性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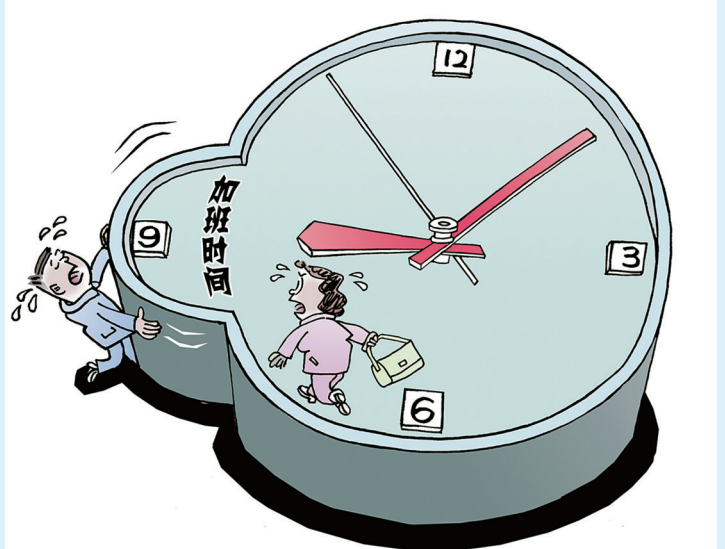
葛洪制药用水的丹井、捣药的灵岩等至今在灵峰山一带留存。灵峰山上现有灵峰寺，虽为佛教寺院，却仍建有供奉葛洪的葛仙殿，是国内罕有的“道佛合一”寺院。类似的传说遗迹在奉化江口、余姚大隐、宁海岔路等地都有留存。南宋宰相叶梦鼎还在《西阳葛氏宗谱》中考证：葛洪次子葛勋迁居金华东阳，其五世孙葛常之迁居宁海西阳（今岔路镇），为西阳葛氏始祖。所以宁海葛姓多奉东晋葛洪为一世祖。

漫画角



变了味

王成喜 绘



基层人员的手表

蒋跃新 绘

知己之可行，止己之不能行

间忍饥挨饿、身体极度虚弱，政治部发给每人一块大洋，让大家“好好吃一吃”。有个小战士实在太饿了，一口气吃了三个“大锅盔”（一种面饼），感觉腹部胀痛，便不再吃东西，也不喝水、不睡觉，不停地在室外走动，避免了胃被胀坏。

林伯渠也领到了一块大洋，舍不得给自己买“大餐”吃，专门买了20斤麦子喂马。饿得皮包骨头的马一下子把麦子吃个精光，结果当晚就被撑死了。人未遭不测，马一命呜呼，区别就在知止与不知止。

熟谙赚钱之道的商贾们懂得，要在波谲云诡的商海中避免翻船，关键在于知止，将经营活动把控在适可而止的节奏之中。为官也是这个道理，知止不仅体现清醒和睿智，而且彰显品德和境界。

音乐大师贺绿汀主持上海音乐学院时，他的外孙女没有考上该院附中，家人便想通过他人入院读。贺绿汀没有答应，还给人家讲了一个老院长萧友梅的故事：1929年，俄罗斯籍教授查哈罗夫觉得班里一位女生音乐素质较差，不愿再教她，而那个女生正是萧友梅的亲侄女。萧二话没说，当即决定让侄女转学。且不说萧、贺两位院长不以权谋私的高贵品格，仅凭他们知止的智慧和勇气，就值得称道。

《晏子春秋》中有一个晏子推让待遇的故事。为方便晏子外出，官府特意给他配备了一套好马好车，但被他推辞了。他说：“凡有血气者，皆有争心。怨生孽，维义可以为长存。且分争者不胜其祸，辞让者不失其福。”这既是晏子的自律之失，更是他的明智之

举。事实表明，祸福之差有时仅在能否知止而已，今天享受了好马好车的待遇，明天就可能对所有好东

西来者不拒。现实生活中的腐败分子正是这样，他们从开始的“不想止”，到中途的“不知止”，到最后的“不能止”，在贪污腐败的邪路上越走越远，最终走上了万劫不复之路。赌徒之所以输得倾家荡产，关键也在不知止，输了想扳回，赢了还想赢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常言道，知足者常乐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知足者常乐——成功时知足，会沉浸在已经成功的喜悦之中；失败时知止，会因避免更多损失而心存快乐；顺利时知止，可以规避再次受挫，虽哀犹乐。

疫情防控中，“数字治理”能发挥什么作用？

新知

郑磊

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，数字治理正在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数字治理，我们有时简称为“数治”，它不是数字和治理的简单叠加，而是两者之间的融合转型，既需要大数据、互联网、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的赋能，更需要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创新。“数治”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数字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的动态关系。数据分析为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提供支撑，而政策的执行效果也需要及时通过数据来反馈和检验。

关于数字治理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“让数据多跑腿”。应该说，经过这几年的数字化转型，我们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。但在此次疫情中，也暴露出一些问题。

比如，具体单个条线内的数字化可能做得较好，但是在横向部门间的数据实时共享和动态协同上，有些方面仍然没有完全打通。从纵向上说，数据在层级间的动态流动也还不充分，有些数据上面掌握了，下面却不知道，所以会有居民抱怨居委会“一问三不知”。因此，数据需要更多向基层赋能，相关信息应及时告知社区和个人，让数据上下流动起来。

要而言之，要实现整体性的数字化转型，不是一个点、线、面上的局部转型，这样才能真正发挥

数字化的力量。

防疫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总动员，因此要加强最接近老百姓的基层的数字化建设。比如，现在不少居委都在小区里建了微信群，但是很多时候，发的都是刷屏或者文字通知，而不是实时在线文档。什么是实时在线文档？现在很多小区团购中用的“接龙”和网络上传的“物资互助文档”就是一种实时在线文档，它能够动态反映需求，随时修改增减，多人协同，一目了然。如果要统计相关情况，比如排摸高龄独居老人，或者对保供需求进行统计时，类似应用就比一个个楼组上报要更方便、更快速，也更准确。

有些已经足够成熟的数字技术，没有被充分利用起来并发挥作用。数字化转型并不等同于数字技

术设施建设，拥有了数字技术，数字基建全都完成了，也并不意味着就必然实现了数字化转型，还要看制度和规则的转型是否跟上了技术变革的步伐，推动转型的制度保障是否力度足够、是否根基稳固。数字赋能不等于数字万能，真正实现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关键能力，比如，组织做好准备了吗？管理理念跟上了吗？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了吗？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数字化转型不能只靠数字技术的单维度赋能，还需要多维度的、特别是非技术因素的全方位赋能。

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、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
来源：上观新闻